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



全球化阴影下的 历史与记忆

王 斑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

全球化阴影下的 历史与记忆

王 斑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 / (美)王斑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ISBN 7-305-04588-8

I. 全... II. 王...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②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D668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792 号

丛 书 名 海外华人学者论丛
书 名 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
编 著 者 〔美〕王 斑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57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ISBN 7-305-04588-8/K·294
定 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在当今世界大开放的新格局中,“全球化”这个名词不啻是经济、社会范畴内的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发展的需要。表现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领域的“全球化”,则呈现为东西方文化的互渗互动、融会贯通,即以全新的学术视野,“打通”的学术眼光,从东西方文化的交互渗透、比较研究中抽绎出中西学术的核心价值,并在学术规范、方式方法上衡之一种共通的学术标准,使学术研究不再围囿于“象牙塔”,或是圈子内激赏把玩的“妙品”,而应该使学术研究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的“普世”的学术价值。

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中,一些海外华人学者走在了前列。他们大都在国内接受了基础的中国文化教育,后又留学欧美,并在欧、美著名大学内从事文化教育与研究工作。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们并没有迷失自我。一方面,他们致力于吸收西方的文化涵养,一方面他们一样倾情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利用熟谙两种语言的学科背景优势,“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从事了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们有时就像一群学术研究的“候鸟”,穿梭往返两大洲之间,利用他们的学术假期和会议时间与国内同行作广泛的学术交流,产生了一批有价值、有创见的学术成果。而这正是我们出版这套“海外华人学者论丛”的缘由。

本论丛收集的大都是这些海外学者近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题材多样,研究形式不拘一格。他们有的文章已在国内外发表出版过,有的则首次在国内出版。我们从审读中觉得,他们的学术视野广阔,学术架构清晰,研究问题敏锐,研究思路富有前瞻性,有些提出了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尤其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规范的精准操作上,给国内的学术界吹来了一缕清风,我们希望这一缕清风能吹皱起国内学术界的一片涟漪。

学术无国界。在这个存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我们突破这种“霸权”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彰显我们东方的学术价值,以撇清西方大众对我们文化认知与解读上的种种误区。我们需要更多的李约瑟、费正清、杜维明、余英时们,我们需要一批东方学术的“传道者”。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这些海外学者们提供一个学术出版的平台,我们乐于充当这样的文化支撑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2日

导言

历史、记忆、现代性

全球资本的扩张，经济结构一体化，各国的相互依存，数码传播媒体的普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等现象，已形成当代潮流。这个趋势迫使许多传统文化迅速奔上后工业社会的道路。急剧转型变化的“新社会”，拚命效仿西方大都会中心的消费风格、生活方式，吸收其媒体和大众文化。在经济领域，发展心切的后来者竭力跻身于国际生产消费和贸易流程。全球化虽然改善了某些区域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但同时也使其他地域更为贫困萧条。全球化趋向平面和同一，侵蚀着富有独特传统和历史、具有别样文化禀赋、日常生活世界的人们。尽管全球化不断扩大国际资本的势力范围，渗透新的领土和疆域，资本的流通和扩展实际上是路子越走越窄，越来越趋向单一平面。资本扩张将不同种族文化，迥异的发展轨迹强行纳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滋生着现代神话的新版本，树立了个体消费生活的耀眼的偶像，人人都得顶礼膜拜。现代神话断言，作为人类理性实践活动的历史已经终结。

随着启蒙、革命和进步等大叙述在二十世纪末的逐步衰退，一个更为宏大、更虚幻的叙述正在登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叙述。这个叙述近十几年来挂上了全球化的新招牌，演绎种种崭新的天方夜谭，展望和预测每一个人的前途，压抑各种不同类型历史发展中别样的线索与轨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旧型社会主义实践的衰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扩张，以发展为指导的现代宏大叙述，虽然在六、七十年代非殖民化和反帝运动中受到冲击，近年来却逐渐成为西方和中国学术界思考和书写中国历史的主流范式。革命时代物质匮乏的阴影，政治压抑的创伤，仍然笼罩人心，因而历史的想象就愈来愈被全球资本的光艳华丽所迷惑。世界市场、中产阶级的繁荣富裕、个体的权力、自由和产权、公民社会、无休止的经济发展……这一切激发人们的幻想和未来憧憬。正如美国学者德立克所言，现代化的大叙述不仅抹杀革命记忆，同时也掩盖了现代性自身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Arif Dirlik et al, 125—156）。^①二十世纪初，德国批评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批判技术进步，科学发展和工具理性的历史神话。他逆历史的主流而行，指责资本主



义现代性虚幻空洞、千篇一律的时间流程(*Illuminations* 261)。本雅明历史批判的启示是,必须发掘现代性进程中另类的蹊径、层次与想象,质疑中国现代性历史的程式化叙述。不断反思、阐发潜藏的记忆,警觉别样的发展进程和前景,才能防止历史想象冻结于事先铺定的、无视历史曲折性的单行道上。在全球化的时代,虽然历史与记忆面临危机,被越来越多人视为弃物,或被重新组装成耀眼的景观和古装剧,但这两个现代性的观念,仍是介入现实的锐器,仍然是强有力的抗拒资源。历史意识的功用在于批判封冻、僵化的历史叙述,潜心寻求文化记忆,发扬未被发掘的可能性,激活未完成的理想,展望历史地表的别样风景线。历史意识可称为想象未来、继往开来的记忆。它为植根于具体时间、空间的本土文化提供不尽的源泉,帮助不同的地域文化质疑和抗衡全球历史宏大叙述的神话。

为了使文化产品不被统一包装成跨国文化工业千人一面的复制品,创造性地发掘文化记忆似能提供新的希望。创造性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花样翻新,而须扎根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因此,对全球化大一统的回应不应是无条件地拥抱经济进步和发展。同时,剑拔弩张的对峙反抗也并不能奏效。对策不应只是东拼西凑、勉强维持生计、朝不保夕的游击盲流战术。自主性文化的建设,需要对全球化有完整、理性的回应,需要与过往的经验发生持久、深厚的联系,开发本土资源,在现代世界的文化交流和对立中创造新文化。

在西方现代性理论中,记忆常被看做是一种心理感情的结构。这种心理积累植根于传统农耕的、小商品生产的城邦和社群。这种心态跟不上日益加速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与日益高涨的历史意识相对立。在马克思、韦伯、德凯姆(Durkheim)、费地南·陀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阿多诺、本雅明以及不少现代性思想家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与记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这两对概念与术语一再被沿用发展,成为一种解释力很强的模式。法国当代重要的历史学家比尔·诺哈(Pierre Nora),在本世纪来临的前夕,对这个叙述模式有一个更为精辟的理解。他指出,历史与记忆的区别来自现代社会与传统社群的崩离。历史与记忆有其各自的社会、社群载体。植根于记忆的社群提供“记忆的氛围环境”(milieux de mémoire)。这种记忆环境弥漫着一种气息或情感氛围。从本土环境向无乡情色彩的现代“地域”或“空间”的转型,意味着社会结构和人情关系的变化,对应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国际,从情感环境到人情淡漠空间转化的历史过程。在剧变中,记忆的持久能保证文化的延续,使之在“传统的温情脉脉中,在习俗家常的缄默中,在日复一日的宗法制度中”持续下去(Nora, xvii—xix)。记忆保证文化传统能够



在个体和群体经验相融合的基础上代代相传，无需借助大规模的理性规划。记忆对那些现代进程中各种主观臆断的、试图彻底改变现存的制度和生活存在的设计不加理会。诺哈不无怀旧慨叹地认为，这种记忆所维系的历史延续性，正在被历史的突飞猛进所摧毁，被愈演愈烈的历史激进意识所稀释。“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对付过去，现代人注定要忘记过去，因为现代人总是被快速的变化驱赶着”（同上XXIV）。

显然，在现代社会的边边角角，“记忆的环境氛围”仍有栖身之所，但早已不是现代社会的心理感情基调。记忆氛围的浓厚气息已变得稀薄了，脱去了魅力，沦为“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emoire）。记忆代表过往社会生活和感情结构，遗留着富于魅力的形态。它是一种“情感和魔法”的现象，由“模糊的、超时空的选择性记忆所滋养”。相反，历史，现代历史话语，其根本特征是理性分析，话语构造，通过冷静、客观的批评方式对记忆遗产进行解魅、分析，破除神话。但现代历史话语并不能完全摆脱记忆，或不能完全放弃对记忆的需求。虽然历史话语属于记忆的去魅场所，超越了记忆的氛围，企图放下记忆的传统包袱，但它仍保留记忆的残留痕迹，“其中吊亡思古的意识仍顽强潜伏下来”（同上）。这表示历史话语在对文化记忆瓦解的同时仍暗暗缅怀文化记忆。

历史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和张力在这里十分明显。我们可以借用诺哈的观点来解释现代中国和西方都有的“批判的历史意识”。现代历史意识代表一种日益强化的、激进的自我反省，一种自觉创造的“世俗”、“现世”、以及“民主”的话语。它批判“自然的”、悠久的、植根于记忆的宗教或伦理的权威，摒弃并改造旧有的日常生活实践。历史话语认定可以与过去生活经验决裂，它向“前”看，由变化所驱使。现代思想中受目的论统辖的历史叙述，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都可以大致归属于这个范围。现代历史假定前程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另一面，文化记忆并不是被动的。文化记忆虽然备受历史的批判解构，千疮百孔，却能提供反批评。这种反批评对现代历史的无止境的、纯粹为了变化而变化的突飞猛进施加钳制，进行反省。因此，虽然现代历史以批判传统和记忆为能事，但文化记忆又可能反戈一击，形成批判武器的批判。怀旧的情形也当如是看。怀旧不仅仅表达了文化心理对过往物事人情的眷恋，而且隐含着对主导历史冒进有力的质疑和对抗。怀旧不意味着在新旧两极之间非此即彼，更不是单纯的厚古薄今，而是在历史的运动中权衡比较时间前后流程中遥相呼应的节点，判断历史进程的合理性，权衡对于大多数人的利弊。这样，我们可以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发现“他者”，产生自我批评，这个他



者,常常就是那个滞后的“记忆的氛围”。

文化记忆需要提到桌面上来探讨,标志着我们赶上了“有趣的时光”,意味民族文化、历史前途暧昧不明,徘徊于十字路口,体现中国社会经历急剧动荡与转型。在西方现代历史中,记忆成为一个反复争议的话题,触发背景是十九世纪末加速的社会转型,工业革命,都市化,电讯传媒的发展,以及乡村农耕经济的大规模解体。二十世纪之初,伯格森,荣格,弗洛伊德和普鲁斯特等人沉潜入各种形式的记忆分析,在迅猛的历史变化中寻求某种中流砥柱(Terdiman)。在现代中国,文化危机与社会浩劫的时代也经历过类似的记忆危机。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在更为大规模的转型中,我们又目睹了力图通过记忆来重新构筑统一的传统和文化的努力。儒家传统在二十世纪初被视为延续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积累,尊为国粹。这一“复古”现象从九十年代至今又在国学复兴的热潮中重演。但儒家的文化记忆并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重演。前期的复古目的是维护行将崩溃的传统,抵御新文化激进革新者的冲击。九十年代,儒家文化的复兴部分是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为指导,力图将儒家文化重构为国际资本发展的同路人。从复兴观点看,本土的国粹,与其视为现代化的进程绊脚石,不如说是事先种下的中国资本主义未来发达的种子(Dirlik)。八十年代中期始,已经有一系列的书写记忆实践,努力唤起过去的情形,探索未阐发的意义:政治残暴控诉,文化寻根反思,怀旧热,缅怀毛。泽东时代,上山下乡怀旧热潮,对社会主义“温暖”时光的呼唤,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眷恋。在文化讨论和文学写作中,也可看到趋向个人的或集体的记忆的转向。这些代表了寻求连续性、共同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努力。

这些种类不同的记忆活动似乎意味着一个共同点:中国现代文化难于对应过去的文化思想遗产。而调整与过去的关系也意味着如何面对现在的挑战、想象未来的前景。记忆活动揭示了文化群体共享的时间观念的断裂,在如何呈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话题上,人们缺乏共识。了解过去,把握当代现实与过去的承继关系,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现代历史受变革和进步观念所驱,力反传统,力求革新。然而,强调历史突进的一面,并不一定要放弃传统和记忆。历史与记忆仍是藕断丝连。记忆是轰轰烈烈历史潮流中隐而不显的釜底之薪。历史书写必须假借文化记忆,而且两者常常难解难分。历史可以成为保存文化记忆和遗产的媒体,将文化记忆中的意象资源据为己有,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总是在有选择地,或主观臆断地选用和再造传统的集体记忆,用以肯定和证实新兴现代国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这种历史化的记忆,最终目的是使现代国家合法化。古为今用的现代历史,与旧时代有机的社群文化

记忆在形式上并无太大区别，都拟定了现在与过去的延绵不断的联系。然而，历史，现代世界为进步所驱动的历史，却又屡屡对传统与记忆进行摧残和挤压。记忆虽然也可勾画出自己的历史轨迹，但比起突飞猛进的历史，它便显得恃之有故，迟滞不前。历史以变革，图新，破旧为能事，一味批判文化记忆，视之为陈芝麻烂谷子。历史不断修正、解构文化记忆，视之为自然的、天经地义的、终古不变的东西。在书写过去的传统时，历史话语对记忆实行批判性的诠释，毫不留情。在现代中国，历史对记忆的诠释常常是反记忆的。历史以革命、激进的态度驱散记忆的魅力，摧毁植根于文化记忆土壤的传统。五四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时期，对过往“传统包袱”的批判通常是无情的。甚至在改革的新时期也是如此，只是那“传统”是近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遗产。

现代史学，如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哈顿（Patrick Hutton）所说，使用集体记忆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服务，将文化记忆融合到历史书写的程式中。现代史学以进步、理性、解放、自由、现代化等主题来构思和叙写一国一族文化政治发展的历程。这个西方十八、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宏大叙述，从二十世纪初年起就面临严重挑战和质疑。哈顿在他的历史学评论中清楚地说明，后现代的史学家和批评家在近二十年来更是大张旗鼓地批评解构宏大叙述。这些批评家和史学家不再觉得记忆是“历史潜藏的根基”，而是把历史和记忆看做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死敌。他们对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的对抗性记忆，反抗性的小历史倒是极有兴趣，但这些后现代的历史撰写人并无意再完整地重构和叙述一段被抹杀的历史，以树碑立传的老方式对被压迫者说话。他们不想再追根溯源，召回被宏大历史所压抑的记忆源头。他们重视“表述那些被记下的过去，怎样铭刻在种种的记忆形式中”（XXIV）。这就意味着寻找零散的意象和记忆痕迹，以考古学的方法考察它们残留在物质形态中的模样，看他们怎样被写进权利和话语的体系。

后现代历史学家受福科考古学方法的影响，十分致力考察记忆痕迹的物质形态和铭刻方式，揭露这些表现方式后面的权利、权威、专制和压迫。但他们并不寻求阐发过去记忆痕迹中潜藏的生机，思变欲望，及历史的前瞻想象，不去发现在表面静止的经验世界和记忆氛围中，其实潜存着种种乌托邦的图新冲动。但是，要想象别样的历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察历史叙述在过往的时间中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形成过程，就不能把历史遗迹仅仅看成是权利的附庸，而不是争取权利的斗争记录，就不能仅仅把历史看作是可以流连忘返的秦砖汉瓦，古趣盎然的废墟瓦砾，就不能只是对过去的痕迹进行验尸般的解剖和研究。要在历史中注入生命，就应把它看成是生生不息记忆和希望的源泉，可能性的宝藏。本雅明写道，历史科学已证实和肯定的东西，记忆



可以修改和翻案。历史若有记忆协助,便能“将未完成的事(追求幸福)完成,将业已定局之事(受苦受难)功亏一篑”(The Arcades Project 471)。这样的历史虽然带有宗教意味,但前提却是十分实际的,政治的,日常的。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终结。历史仍携带未完成的旧梦有待实现,有未抚慰的创伤有待疗治,有长期的不平冤屈以呼号的举动。所以,历史不仅仅是瞻前思后的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继往开来的现实的政治实践,是集体的有理性的联合行动,目的是创建更为合理平等的社会。

历史与记忆间的辩证关系显示为两者之间的频频往来互动。五四新文化时期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写作,是在断裂之间重新建立过去与现在的想象联系,使目前的政治理想和活动合法化。八十年代以来,呈现出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大力呼唤现代化的来临,其势头要把历史的实践和政治斗争拱手交付于经济与市场无形的手。^②另一面,全球化的神话又招致记忆一端的抗拒,而这记忆却是早期的历史实践,被人们忘却而“退化”,成了无关痛痒、古意盎然的“记忆”。记忆与历史间的对立,互动和置换在全球化气氛中进入了一种更为戏剧化的阶段:一边是前瞻加速,另一面是记忆的迟缓拖延。前瞻加速响应的是全球市场的魅力,与经济发展的新神话接轨。而记忆的后顾拖累,则要抱守某种过去时代的形象,某种可行、可维持、更贴合人情的生存逻辑,用以对抗加速的全球进程。

虽然全球化仍拖累着难于克服的贫穷,两极分化,政治压抑,不平等,暴力,苦难,发展不平衡等等困境,但新近时髦的历史终结论却为历史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收尾句号。怀旧心态,则认为伤痛并未痊愈,疗程效果悬而未决。怀旧力图质疑、批评脱缰野马似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创伤经验在历史与记忆的错综关系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在现代中国,创伤大致具有两种类型。一是历史浩劫遗留的潜在记忆,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统治,战乱,集权政治,动乱浩劫相牵连。另一种是目前在国际资本入侵和社会人际关系全面商品化的情境下,旧有的生活秩序和经验世界一夜间的崩溃而造成的震惊,这实际已构成又一场触动人们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在西方,近年来的创伤研究忽然形成热潮,但十分有限,一般论点将创伤理解为历史暴力对个体心理的重创,十分重视心理的回应和自我调整功能,但每每囿于描述创伤病态而不能自拔。我们应超越这种局限,推而广之,把创伤看做是对文化整体的延续性的摧残。创伤的事件,切断了个体连接群体的感情纽带,破坏了文化结构中人们共享的意义与价值体系。而这个体系则必须由文化个体用记忆和身体实践维持,以保证社会和个人生活应有的最起码的整合感与生存意义。这个体系使人能够叙述往事,使经验产生意义,维系过去、

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延续性。从这个角度看，创伤体验和病症，也意味着历史叙述和写作的危机。

作为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中颇受欢迎的课题，西方的创伤研究重视受创而瘫痪的心理结构，探讨旧有或现存意义体系与叙述方式的解体。因此这项研究为热门一时，但现在渐渐冷却的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稍稍提供了一线生机。与此相关的还有强调文化的断裂，叙述的解体，心理结构的崩裂；重视无底深渊、无以言说的崇高美学，颠覆和搅乱所有现存范畴和体系。虽然有些学者寻求把创伤的分析从个体心理、临床治疗和解构主义的狭小空间中解放出来，用它来讨论历史书写，社群建立，认同身份，群体记忆等更广博的政治历史问题，但创伤与重大历史和政治问题的正面联系却仍是模糊不清，缺乏深究(Caruth)。

面临着快速的市場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批评的眼光反省中国现代性的整个进程。有些人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近十几年来国际资本的扩张使现代历史充满了创伤性体验。甚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错误也可视为是现代化超英赶美，在生产力上超过西方的种种大跃进的结果。现代的创伤经历是支配人们认知、价值取向和书写历史的潜在背景。但历史观察者应自觉反省创伤，而不是仅仅承认创伤的压力，在不觉中听任创伤影响历史的解读。历史创伤常常会左右或限制人们的另类历史的想象，在浩劫之后无眠痛定思痛，惶惶趋利避害，导致矫枉过正，思维偏置。在《在创伤记忆的环抱中》这篇文章里，王晓明认为，近年来新兴的消费意识和极端的利己倾向，是对革命和贫困的创伤记忆的过火的反应。人们疯狂追求个体利益，力争物资繁荣，消费无度，导致政治意识薄弱。这种风气掩盖着一种不言的、对任何与政治、群体相关的活动，对公众生活，社会、国家、与历史记忆的恐惧(王晓明编 238—242)。由此而推之，那些追求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膜拜市场魔法的倾向，后面暗指的是过往历史中政治的“不自由”，日常物质生活的匮乏，以及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可是，经济衰退，失业的困境，贫富两极分化，社群关系纽带的崩脱，国际霸权的专横，地缘政治权力的失衡，现代化、全球化便罩上了阴影。此时，价值的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人们开始怀念社会主义时代“阳光灿烂”的“幸福时光”，缅怀牧歌式的村社农庄，自力更生的自主自觉意识。同时，又不加分析的摒弃像民主、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等所谓西方独有的观念，放弃现代启蒙传统中有价值东西。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瞻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创伤体验有可能会加强，也可能会歪曲和偏置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对创伤记忆的自觉反省，可以防止我们把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权力为指归的历史进程，看做是天

经地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瞻明信举了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青年人为例。这代人成长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的年代,不堪消受中产阶级郊区的富裕、“正常”的刻板生活以及极端的个人消费主义。他们也经历了某种“文明”的心理创伤或厌倦。而五十年代热烈追求的公式化、装潢完美的个体消费生活方式,又是对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集体总动员,对群体生活压力过度的反应。面对缺乏意义的消费的生活,面临美国军政集团在东南亚的入侵,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激进的年轻人重提加强群体社团的联系,重振民权,以公众的热烈行动表达了群体的政治想象。相反,前苏联的人们由于不堪忍受几代人经历的“抱团相处,聚族而居”的集体组织所造成的灾难,就极容易对群体生活表示极大的厌倦和恐惧。由于这种两面性,对于创伤记忆应进行严格的历史阶段性的分析反省,从而防止将某种主观价值体系物化为、尊奉为自然的铁规律。比如,认为资产阶级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图景是势所必然,比别的历史想象要高明,要优越:

历史上两代人之间的不同经验所产生的象征和意味,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以防止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将历史自然化的倾向以为集体的活动必然与人的自然本能相悖,人们本能地要回到个体私人的生活,而消费和市场对一般人来说,比政治之类的事更为正常,更富于吸引力。(The Seeds of Time 102)

由此观之,创伤记忆有可能会成为过去留下的重负,使人们反弹过度,没有理性的清晰。从另外一面来说,与创伤的负面影响保持一定距离,能使历史观察者得到一种诠释的方法,获得读解历史的不同途径。读解历史,意味着从主流的历史想象回溯到创伤的源头,考查其萌发的情境。尼采论说的批判的历史意识与此十分相近。尼采认为,历史的使用,旨在使人们认识到“他们观察事物,并且要求别人也这么观察的范式,都具有偶然性”。作为创伤的幸存者,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或批评家也许要诅咒谴责历史的错误和偏置,也许他们觉得已经死里逃生,隔岸观火,但他们不能逃脱他们多少是创伤经验的产物这样的命运。批评的历史意识就是要不避讳创痛,但也不能被动地当创伤的俘虏,“要从事后的眼光来追想过去时代的可能性,从而憧憬更良好的未来,而不是仅仅默认自己是历史的产物”(Nietzsche 9)。尼采的这句话似应这样理解:追想过去摆脱创伤悲剧的可能性,以作为克服创伤的根据,这样就能从历史在押人质的窘境中走出,能动地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历史的话语

可以定义为：对不同创伤情境的积极反应和对策，这样的历史意识就有希望减少重复过去灾难的几率，或减少历史被物化、被锁定为自然规律的可能。

现代中国记忆和历史课题，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美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个课题上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针对政治受难的记忆实践和官方历史之间的对立，学者们作了不少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探讨。有的学者着眼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专制与相应的遗忘机制之间的联系。另一些学者则力图描写记忆活动的社会历史，考察大众民间的习俗和礼仪如何保存草根记忆。这些研究的特点着重社会实践与社会习俗(Rubie Watson; Vera Schwarcz, *Bridges*)。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叙述的研究可以在审美的文本中进行，历史的想象可以在诸如电影、小说、自传等文本中进行阐发，进一步了解深藏在审美形式中的、针对创伤记忆而发的心理反应。

本书讨论中国现代性中历史与记忆的对立和互动，这大致可勾勒出三种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历史问题的一些思考，体现在鲁迅，胡适，梁启超，章炳麟，顾炎武等许多人的思考写作中，尤其在他们讨论现代性的文本中。五四的历史观一般被认为是以西方启蒙的进步、理性与自由等主题为旨归，但这个具有民族自决、目的性鲜明的历史意识还应看做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回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衰微因时因地的对策。这个民族国家的主题在过去主导历史叙述中已经说得很多，但近年来却被人遗忘。在后现代、后殖民历史观的指导下，一般评论趋向无止境的解构，将五四的历史想象简化、归结为所谓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直线论，进化论，或轻易将它与后来的主流话语，霸权话语相提并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似乎黑格尔，马克思都成了现代专制、政治浩劫的代言人。这种说法，与美国媒体称某个小国的武装反抗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暴乱组织”，跟把海德格尔的存在思考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完全等同，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从历史和记忆的角度看，我们应把所谓五四主流话语的兴起当作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十分实际的反应。本书的开题，将着重五四时期历史思考，其中重要一环是现实主义的历史书写和呈现。这个书写批判文化记忆中积淀于传统小说和戏剧里的审美习惯和范式，书写新崛起的批判意识。这个意识表现在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偏置的质疑。同时，还反映在五四思想者学习西方美学概念，在中国情境中阐释和挪用悲剧观念。创伤与历史的写作，还表现在创伤的视觉体验在电影上的反映。这些方面，可看做是含有政治实践功效的历史书写。这种历史书写在想象中国前景时，一方面借用西方启蒙主义的理性遗产，同时也不忘中国本土的民间记忆中的文化资源。

第二个主要趋势可以描述成一种批评的历史观。这观点把历史看做是



危机四伏、创伤累累的身体体验,而不是什么高歌猛进、跌宕起伏的历史情节。这种历史观念明显表现在文化革命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这种历史观的引导下,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痛定思痛,悉心思考和理解刚过去的浩劫历史,他们的思维触角深入到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幽密处。回溯过去历史的寻根活动产生了一大批创意深远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其中较为成功的,拒绝消释、化解或回避创伤体验,在文本中保留创伤的痕迹,抗拒悲喜剧、煽情剧造成的大喜大悲涕泪流连的效果。煽情叙述的基本假设是,创伤隐患能假借动人情节而药到病除。八十年代具有批判意识的历史书写,培养了对于编织宏大叙述的警惕性,为描写情绪激昂故事的热昏头脑降了温。持续的创伤反思质疑妙手回春似的虚假康复。这种历史书写挑战既定的身份认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系统,挖掘未被承认的经验,缅怀被遗忘的记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商品消费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产生了新的记忆书写实践。九十年代目睹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消费文化的成型,国际资本的涌入,随之而来的是历史意识的退隐。在全球化统一趋势的压力下,历史蜕变为无香无臭的商品,虚化、软化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然而,在电影、文学和批评话语中,有识之士仍努力呼吁加强批判性的历史意识,呼唤过去亲情记忆,有的则含有怀旧和重造新神话的意味。这说明历史可以是没有神话时代的神话替代物,只是这是世俗的,自选的,不必将其膜拜。商品消费文化使得日常生活发生“去魅”现象,与此相对的文化生产和表达则致力于发掘另一种“崇高”的历史,寻觅过往的社群生活,重新恢复记忆魅力,寻找记忆氛围。这种记忆工作既是消费社会的一种症候,也对其进行批评。它本身并没有摆脱景观社会的展览逻辑,也许是一种缺乏真正历史记忆的怀旧。但反过来,它又表达了要克服和超越日益平面呆板的生活形态的强烈欲望。

随着国际资本的扩张,市场经济的深化,文化领域的商品化,全球化的普世历史观从九十年代至今愈演愈烈,成了高昂的主调。但是全球化过程中怀旧心态和相关文化创作重新崛起,充满活力。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体化使大陆、香港、台湾更加紧密连在一起。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使我们的视角投向两岸三地。台湾和香港应付国际经济网络中本土性和全球化的问题,历时已久,中国内地近年来开始体验到这个问题的严峻和棘手。考察近十多年文化创作的努力,可以将其看做是对汹涌突进的国际资本的艰难对策和回应。国际资本的扩张,以商品交换为驱动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使旧有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纽带分崩解体。在这种情况下,真实的体验、个人认同和公共群体

生活，即前面提到的“记忆的存在氛围”，变得越来越难维持。从记忆和历史互动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分析大陆港台三地的文化创作如何抗拒商品和资本世界的压力，同时又在这个世界中力挽狂澜，在物化的潮流中寻觅真实的体验。呼唤怀旧的记忆和意象，重构集体记忆和尚留存的日常生活实践，三地的文化创作努力在全球日益侵蚀本土文化记忆的大气候中，保持对别样历史前景的憧憬和想象。

[注释]

① 引用书目的页码或作者在正文中显示，一人多著者以缩减书名，出版详情见书后目录。

② 王晓明和其他批评家称此为“新的意识形态。”见王晓明编，《在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内 容 提 要

质疑全球现代性应阐发潜藏的记忆,警觉别样的历史轨迹和背景,历史想象封冻于历史终结论。本书论证,虽然历史与记忆面临危机,或被组装成古雅的消费景观,但仍是强有力的抗拒资源。历史意识批判僵化的历史叙述,潜心寻求文化记忆,发扬未完成的可能,展望中国现代性的别样风景线。

目 录

导言 历史,记忆,现代性	1
第一章 传统,记忆与希望:鲁迅与批判历史意识	1
第二章 悲剧视角,创伤视觉,历史蒙太奇	32
第三章 以创伤基调的革命后历史:本雅明的启示	60
第四章 时间,现代性与神话:王安忆的记忆小说	90
第五章 历史与悲喜剧:银幕创伤历史	107
第六章 从史诗叙述到散文世界	123
第七章 呼唤气韵的记忆:朱天文的现代都市怀旧	137
第八章 爱在灯火阑珊处:《长恨歌》中的时间,商品与怀旧	150
第九章 不忘现实主义:全球景观中的城市电影	170
第十章 冷战记忆,帝国审美与中国研究	190